

從借字看突厥、回紇的漢化

陳 慶 隆

一、前	言
二、政 治 經 濟	
三、宗 教 信 仰	
四、曆 法 道 術	
五、文 教 語 言	
六、結	語

一、前 言

近世，突厥字母之謎揭曉後，突厥碑文的解讀乃告迎刃而解。同時，西方與日本探險隊探查的結果，埋沒於西域的回紇文卷亦相繼出土。這些突厥學的至寶，經 Bang, Müller, von Gabain, Rahmeti Arat, Radloff 及 Thomsen 等碩學之士的整理，亦先後出版，更充實了突厥學的材料。突厥、回紇的文字、語言及歷史亦因之大明。然突、回語中的漢語借字則仍散見於各文獻中，而缺乏全面性的整理與探討。雖然匈牙利學者 Ligeti 及 Csongor 曾有文章討論過一些借字與漢語的關係，但僅止於語音上的問題。¹ 其歷史背景及文化上的意義則尙待探討。

事實上，無論那一民族，都免不了物質文化或精神文化的交流。文化既有交流，

1. L. Ligeti: "Sur quelque transcriptions sino-ouigoures des Yuan", *UJb* 33 (1961), pp. 235-244.

"Mots de civilisation de Haute Asie en transcription chionoise, *AOH*, I (1950), pp. 141-185.

"Çin yazısıyla yazılmış barbar glossaları meselesi", *DTCFD* 9: 13 (1951), çev. H. Eren, pp. 301-327.

B. Csongor: "Chinese in the Uighur Script of the T'ang Period", *Acta Orientalia* 2: 1 (Budapest 1952), pp. 73-121.

"Some More Chinese Glosses in Uighur Script", *Acta Orientalia* 4: 1-3 (Budapest 1955), pp. 251-7.

另外，P. Pelliot: "Kao-tch'ang, Qoco, Huou-tcheou et Qara-khoja", *JA* 19: 3 (1912), p. 588
亦曾提到漢語鼻音韻尾 -ng 在突回譯音中皆告消失。

語言方面就不能沒有影響。所以不屬雜外來成份的語言是沒有的。在各種語言裏，最顯著的外來成份，是從別的語言裏轉折引用而來的語詞。即一般所稱之借字。語言本是文化整體的一部份。也是瞭解文化精神現象的關鍵。尤其是借字，在民族文化的研究上更是深具意義。

本文擬從突、回語中的漢語借字，觀察其採借的途徑，據以分析漢族與突、回族的歷史關係，並討論漢文化的傳播。

本文所收錄的借字，大部份為一般突厥學家所認定者。小部份為本人所增補。其在語音及語義上均相當的明確。有關的論證，將另外與其他待考的借字一併討論。至於本文所用的對音，係採用 *Drevnetjurškiĭ Slovar'* (古突厥語辭典) 的標音。²

借字的分類是以借字本身的意義為準。其後分別註明字源及出處。為討論之方便，共歸納為四大類：政治經濟類、宗教信仰類、曆法道術類及文教語言類。

二、政治經濟

中原與中、北亞的交通源遠流長。平時則來往貿易互通有無；戰時則互動干戈攻殺擄掠。史書記載頗詳。儘管漢族與突、回族各處不同的環境，過着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文化交流的結果，漢族的政治制度也逐漸流入突、回族中。特別是職官則被廣泛的借用。如天子，匈奴譯之為「撐犁孤塗」(Taŋri-qutu)。³ 突、回人則取對音，稱之為 tänsi (Th S II₁)。其他宮庭的職官，亦均使用漢語對音。如：

quan-qiu <皇后 (TTVIII 40 ₁₀₆)	qunčuj <公主 (KT 20)
quan-tai-qiu <皇太后 (TTVII 40 ₁₂₅)	tajsĭ <太子 (TTII A 64)

突、回語的 qaŋan (可汗)、qatun (皇后)、tegin (太子)、qan (汗) 或同時並用；或完全被取代。他如 širkin <紳衿 (FT 3₁₁) 等字亦流行於突、回語間。再如武職及地方長官亦在採借之列。如：

saŋun/seŋün <將軍 (E 48 ₃)	taj saŋun <大將軍 (Th S IV ₅)
tutuq <都督 (MK I ₃₈₀)	čaŋši <長史 (E 31)
tutun <都統 (FT 2 ₁₁₇)	čigsi <刺史 (Th S IV ₁₂₁)

2. V. M. Nadeljaev-D. M. Nasilov-E. R. Tenišev-A. M. Ščerbak (ed.): *Drevnetjurškiĭ Slovar'*, (Leningrad 1969).

3. 漢書匈奴傳 (樂天本) 94上/3751:「撐犁孤塗單于」。「匈奴謂天為『撐犁』，謂子為『孤塗』。」

考上述職官，古時一軍之率稱爲將軍。春秋穀梁傳，文公六年冬十月載：

「晉將與狄戰，使狐夜姑爲將軍」。⁴

通典則云：

「晉獻公初作二軍，公將上軍，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。魏獻子、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。自戰國置大將軍，周末又置前、後、左、右將軍」。⁵

至於長史，漢書百官公卿表云：

「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，有兩長史」。⁶

後漢書百官志亦云：

「每郡置太守一人……丞一人。郡當邊戍者，丞爲長史」。⁷

至於刺史，「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……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……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」。⁸ 至於都督，「建安中魏武爲相，始遣大將軍督之，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爲三都督」。⁹ 至於都統，則「置於唐天寶之末」。¹⁰ 顯然這些職官的設置，在中國相當的早。但其傳入突厥、回紇則晚在唐朝。因周書突厥傳云：

「大官有葉護，次設，次特勤，次俟利發，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，皆世襲之。……侍衛之士，謂之附離」。¹¹

舊唐書突厥傳則云：

「可汗者，猶古之單于。妻號可賀敦，猶古之閼氏也。其子弟謂之特勤。別部領兵者，皆謂之設。其大官：屈律啜，次阿波，次頡利發，次吐屯，次俟斤；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」。¹²

4. 春秋穀梁傳（藝文本）10/9a。

5. 通典（商務本）28/163。

6. 漢書百官公卿表（樂天本），19上/724。

7. 後漢書百官志（樂天本），28/3621。

8. 漢書百官公卿表（樂天本），19上/741。

9. 通典（商務本）33/185。

10. 續通典（商務本）36/1343。

11. 周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50/2339；參北史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99/3048；隋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84/2536。

12. 舊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194上/3596。

同時，新唐書突厥傳亦載：

「突厥阿史那氏……至吐門逐疆，大更號可汗，猶單于也。妻曰可敦。其別部典兵者曰設。子弟曰特勤。大臣：曰葉護，曰阿波，曰俟利發，曰吐屯，曰俟斤，曰閼洪達，曰屈律啜，曰頡利發，曰達干，凡二十八等。皆世其官而無員限。衛士曰附離」。¹³

足見突厥原有其職官。借用漢語職稱，始見於突厥碑文及新、舊唐書。故借字之轉入，當在唐朝。舊唐書突厥傳云：

「永徽元年，……車鼻聞王師至，高宗數其罪而赦之，拜左武衛將軍，……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，置狼山都督以統之。車鼻未敗前，遣其子菴鑠入朝，太宗嘉之，拜左屯衛將軍，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。車鼻既破之後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。於是分置單于、瀚海二都護府。單于都護領狼山、雲中、桑乾三都督，蘇農等一十四州；瀚海都護領舍微、新黎等七都督，仙萼、賀蘭等八州。各以其首領爲都督、刺史」。¹⁴

又載：

「（溫）彥博既口給，引類百端，太宗遂用其計。於朔方之地，自幽州至靈州置順、佐、化、長四州都督府；又分頡利之地六州，左置定襄都督府，右置雲中都督府，以統其部衆。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、中郎將等官，布立朝廷」。¹⁵
至於回紇，其借用漢職稱，也當在同一時代。因舊唐書迴紇傳云：

「（貞觀二十年）太宗爲置六府、七州。府置都督，州置刺史。府、州皆置長史、司馬已下官主之」。¹⁶

回紇以下鐵勒諸部入朝時，「皆以首領爲都督、刺史、長史、司馬」。¹⁷且據上述，čub＜州（BK 24）之借入也當在此時。突厥碑文中已見有 altī čub＜六州（BK₂₄）之名以稱粟特領地。

13. 新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215上/4130。

14. 舊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194上/3597。參新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215上/4131。

15. 同前。

16. 舊唐書迴紇傳（開明本），195/3601。

17. 新唐書回鶻傳（開明本），217上/4139。

從官庭方面的借字顯示，突、回族的統治階層已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。同時，地方的職官與行政區域的劃分也模仿了漢人。

從經濟方面的借字更使人相信，漢族的許多日常用品均與突、回人有所流通。突、回人的經濟生活也深受漢族的影響。事實上，漢族與邊疆民族間的交通，開始得很早。張騫初至大夏，已見有邛竹杖蜀布。是知未通西域以前，滇蜀與印度間已有商旅來往。班超伐焉耆，亦發兵及吏士賈客四百人。¹⁸ 漢代經營西域有成，東西來往僑居者已不少。漢人之經商於西域者亦大有人在。¹⁹ 而且西域既通，行商可倚漢使及漢官之保護，來去更為安全。反觀中、北亞諸民族，亦樂與中國易有無。「渠犂其旁國少錐刀，貴黃金、綵繒，可以易穀食」。²⁰ 「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，……其人皆深目……善賈市，爭分銖」。²¹ 康居則為求商而納侍子；罽賓則為互市而奉朝貢；安息則為綵繒而遮道。「商胡販客，日款於塞下」。²² 南北朝，後魏勢盛之時，大敗柔然，西域交通更形密切。商賈雲集於京師。後魏末，突厥至土門，「部落稍盛，始至塞上市綵絮，願通中國」。²³ 隋大業十一年春正月，「突厥……龜茲、疏勒、于闐、安國、曹國、何國、穆國……等國並遣使朝貢」。²⁴ 河西都郡已成為中西貿易站。商賈東來貿易者，不計其數。「突厥部落大人，相率遣使貢馬萬匹，羊二萬口，駝、牛各五百頭。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。詔許之」。²⁵ 「隋末亂離，中國人歸之者無數」。²⁶ 更促進雙方的文化交流。唐朝勃興，開疆拓土，遠及中亞、葱嶺以西，商旅往來不絕於途。至唐取天山南路，平西突厥後，西域交通益見頻繁。遠赴中亞、波斯及印度之商旅，已屢見不鮮。玄宗朝雖兩次下禁令曰：

18. 後漢書班梁列傳（樂天本），47/1581。

19. 史記大宛傳（樂天本）123/3170：「天子好宛馬，使者相望於道。諸使外國，一輩大者數百，少者百餘人。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。其後益習而少衰焉。漢率一歲中，使多者十餘輩，少者五六輩；遠者八九歲，近者數歲而返。」

20. 漢書西域傳下（樂天本），96下/3912。

21. 史記大宛傳（樂天本），123/3174。

22. 後漢書西域傳（樂天本）79/2931。

23. 周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50/2339。參北史突厥傳（開明本），99/3048。

24. 隋書帝紀四楊帝下（臺北洪氏出版社，民國63年）4/88。

25. 北史突厥傳（開明本）99/3048。參隋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84/2536。

26. 北史突厥傳（開明本）99/3049。參新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215上/4129。

「諸錦、綾、羅、縠、繡、織成紬絹絲、犛牛尾、眞珠、金、鐵，並不得與諸蕃互市。及將入蕃，金、鐵之物，亦不得將度西北諸關」。²⁷

又令：

「如聞，關以西諸國與販往來不絕……自今以後，一切禁斷，不得更有往來」。²⁸

然西域交通並未因此斷絕。商賈仍假道回紇繼續經營。貞元三年，唐雖要求「(回紇)無得攜帶中國人及商胡出塞」。²⁹ 仍無法阻禁商旅。五代自晉、漢以來，回紇每至京師，禁民以私市。易得寶貨，均鬻之入官。民間有市易者則罪處。但至「周太祖命除去舊法，每回紇來者，聽私下交易」。³⁰ 至宋宣和中，「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，公爲貿易，至留久不歸」。³¹ 元朝，長春真人西遊至邪米思干見：

「其中率多回紇人。田園不能自主，須附漢人及契丹、河西等。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。漢人工匠雜處其中」。³²

由阿里馬歸至燕京又見：

「儉儉州 (Kem-kemjut)……漢匠千百人居之。織綾、羅、錦、綺」。³³

另外，常德西使亦見：

「(鐵木爾懺察 Temor čam čabsar)守關者皆漢民。……出關，至阿里麻里城……回紇與漢民同(雜)居，其俗漸染，頗似中國」。³⁴

總之，交通的流暢，貿易的發達與民間接觸的密切，增加了借字的流入量。動、植、礦物的名稱，如：

čavzu <棗樹 (MK 213₂)

la <騾 (TT I₁₂₆)

čüsüm <桑椹 (Rach I_{157,191})

lenxua/linxua <蓮花 (TTVIID₃₆)

27. 唐會要 (臺北世界書局，民國49年) 冊三，86/1581「市」條。開元二年閏三月勅。

28. 同前，86/1579。「關市」條。天寶二年十月勅。

29. 資治通鑑唐紀四九 (臺北洪氏出版社，民國63年) 233/7505。

30. 舊五代史回紇傳 (開明本) 138/4375。參新五代史回紇傳 (開明本) 74/4480。

31. 宋史回紇傳 (開明本) 490/5718。

32. 元長春真人：西遊記，載於張星娘：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(臺北世界書局，民國58年)，冊五，頁401。

33. 同前，頁429。

34. 元常德：西使記，載於張星娘：前引書，冊五，頁456。

qamsun < 甘松 (Rach II 2₈₃)
 quma < 胡麻 (Rach I₆₄)
 qundu < 紅豆 (TT VIII 16₁₄)
 toj < 搯 (MK III 141)

tuŋ < 銅 (Suv. 355₆)
 xojtsi < 蕙子 (TT VIII A39)
 xua < 花 (Rach II 1_{92,107})

日常用品如：

bōz < 布子 (MK I₄₉)
 bandar < 板凳 (Lok 11₉₂)
 čanču < 輾軸 (MK 210₁₀)
 čaŋ < 鉦 (Suv. 27₁₈)
 čuŋ < 鐘 (Uig III 29₁₄)
 čuz < 綢 (QBN 343₈)
 ʃajtsi < 骸子 (Uig. II 44₃₈)
 jenčü/jünčü/zenčü < 眞珠 (MK II 9)

kimsän < 金線 (MK I 437)
 lav/lab < 蠟 (MK 512₁₆)
 lug < 爐 (TTV A₁₃₀)
 mir/mir < 蜜 (Rach II 4_{28,1132})
 qaj < 鞋 (MO 1₁₀)
 so < 鎖 (KP 315)
 zünün/zünkün/zünim < 絨錦 (MK 242₁₂)

度量衡之類如：

ban < 萬 (USp 105₅)
 čaŋ < 長 (Suv. 4₇)
 čeŋ/šiq < 升 (Rach III₈₁)
 čig/čix < 尺 (Suv. 41₁₂)
 šoŋ < 雙 (Hüen 1844)

tsun < 寸 (Uig. II 86₁₂)
 tu < 度 (TTVII 1₃₀)
 qav < 合 (Uig. II 77₂₆)
 taj < 大 (USp 67₂)

自然而然地被借入突、回語中。此外，經濟生活方面的借字更饒趣味：

bao čao < 寶鈔 (USp 15)
 baošin < 保人 (USp 12₁₉)
 saŋ < 倉 (Uig. I₂₉₂)
 siči < 四至 (USp 13₇)

tajpaosin < 代保人 (USp 12₁₂)
 tiŋtsuj < 田租 (USp 88₃₉)
 toŋšu < 同取 (USp 12₁₂)

從 bao čao (寶鈔) 的借字得知，突、回族的正規交易，已逐漸脫離物物交易的方式，而代之以漢族的幣制。同時從 tiŋtsuj (田租)、saŋ (倉) 及 siči (四至) 等借字顯示，突、回族已逐漸步向定居的農耕社會。據新唐書突厥傳：

「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，農器三千具，鐵數萬斤……於是納言姚璹等建請與之。乃歸粟、器、降人數千帳」。³⁵

是知突厥在北亞已稍具農耕雛形。回紇西遷後：

「其地（西州、甘州）宜白麥、青糲麥、黃麻、葱、韭、胡葵；以駱駝耕而種」。³⁶

金烏古孫仲端北使，則見「桑、五穀頗類中國」。³⁷ 元耶律楚材至阿里馬城亦見「播種五穀，一如中原」。³⁸ 長春真人西遊記亦載：「（烏里雅蘇台）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，水草極少。始見回紇決渠灌麥」。³⁹ 至阿里馬城，見「農者亦決渠灌田」。⁴⁰ 由阿里馬城至斜米思干，見「平地頗多。以農桑爲務，釀葡萄爲酒。果實與中國同。惟經夏、秋無雨，皆疏河灌溉，百穀用成」。⁴¹ 常德西使記亦云：「數日過龍骨河（Ulungur），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相值。近五百里多漢民。有麥黍穀。……又西南行，過孛羅城，所種皆麥稻」。⁴² 「過搏思干城，城之西，所植皆葡萄、粳稻。有麥亦秋種」。⁴³ 因有農耕，故有倉庫貯藏穀物。田租之制亦應運而生。同時才有四至以界定範圍。所謂四至，是立石以誌四方所至之地界。碑版廣例云：

「書地界四至雖自晉太康瓦朔有之。唐人則見於開元廿八年王守泰記石浮屠。後書東西南北四至之下，又總之曰：四至分明，永泰無窮。末加吉語，雖出漢例，在唐爲初見」。⁴⁴

是知四至之例，早見於中國。回紇文獻所載：

「bu borluqnın sız-sı ögdüri qaratemürniñ borluq adırır
kötüri jerkä sız-sı ökän ädirir. (USp 137)

35. 新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215上/4129。參舊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194上/3596。

36. 新五代史回紇傳（開明本）74/4480。

37. 金烏古孫仲端：北使記，載於張星娘：前引書，冊五，頁299。

38. 元耶律楚材：西遊錄，載於張星娘：前引書，冊五，頁329。

39. 元長春真人：前引書，冊五，頁372。

40. 同上，頁387。

41. 同上，頁394。

42. 元常德：前引書，頁455-6。

43. 同前，頁457。

44. 清王芑孫：碑版廣例（行素草堂金石叢書）8/38a-38b。

(此葡萄園之四至，東至 Qara Temir，西至河)。

其用法正與之脗合。然其傳入應在回紇西遷 (840 A. D.) 之後。

至於 paošin (保人)、tajpaošin (代保人) 及 toyšu tajpaošin (同取代保人) 的借入，顯示突、回人的經濟生活上，已有訂約的法律行為存在。事實上，金代烏古孫仲端已見：「其書契約束，並回紇字，筆草其管」。⁴⁵ 茲再舉回紇土地買賣契約書為證，並把借字斜排以資識別：

- 1 Koin jil äräm ai on säkiskä pis Enč-puka
Jaruk ikäkü Tartış apam ölgän ärkäntä *pitik*
pertimis ärdi *Koçu*-taki taisaŋ porluk palik
porluk taštın kač pölük jerniŋ satiki
- 5 alti jüs jastuk *čau* ičintin jüs jastuk perip
kolrap peš jüs jastuk *čau* kalti pu *čau*-ni
Okul-tekin jaŋkämiskä jas küs kim kälsär
tägürüp perür pis. tägürüp permäsär pis pu.
*pitik*ni kim alip kälsär näkükä ma tiltämäjin
- 10 pütürüp perür pis. pu *pitik*-täki *čau*-ni perkiŋčä
pis Enč-puka Jaruk ištın taštın par jok
polsar pis birlä alkuči *toyšu tajpaošin* män
Enč-pukanıŋ inim Asan män Jaruknuŋ
oklun Kara-tokma ikäkü pu *pitik*-täki
- 15 *čau*-ni *pitik* josunca näkükä ma tiltämäjin
čamsis köni perür pis.
pu nišan män Enč-pukanıŋ ol
pu nišan män Jarukniŋ ol
pu nišan män *paošin* Asanniŋ ol
pu nišan män *paošin* Kara-tokmanıŋ ol

20

45. 金代烏古孫仲端：前引書，頁300。

pu nišan mǎn tanuk Turčiniŋ ol

pu nišan mǎn Jarukniŋ ol

pu nišan mǎn tanuk Tülük-karaniŋ ol

mǎn Tokma pular Enč-puka Jaruk ikäkäniŋ

25

sösincä *piti*-tim ⁴⁶

中譯如下：

1 羊（未）年正月十八日 Enč-puka

與 Jaruk，我們兩人在家姊去世後

給予書面如下：高昌之 Taisaŋ（？）葡萄園、城市

園地及其他塊地，售價共

5 六佰 jastuk（錢之單位）。其中一佰先付。

餘款尙有五佰。此款項

將於來年春秋向敝甥 Okul-tekın

備妥交付。若於限不還

持書前來者無論如何

10 將付款了結。上款未付前

我們，即 Enč-puka 與 Jaruk 兩人，若東西逃避

同取代保人，即

Enč-puka 之弟 Asan 與 Jaruk

之子 Kara-tokma 兩人，對於上款

15 無論如何將如約

心甘情願地償還。

此乃我印 Enč-puka

此乃我印 Jaruk

此乃我印 保人 Asan

20

此乃我印 保人 Kara-tokma

46. W. Radloff: *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* (Leningrad 1928), pp. 12-13.

此乃我印 證人 Turči

此乃我印 Jaruk

此乃我印 證人 Tülük-kara

我 Tokma 依 Enč-puka 及 Jaruk 兩人之

言撰寫。

從借字及體裁(詳後)看,其受中國之影響相當明顯。「鈔法始於宋之楮幣」,⁴⁷「元初悉用鈔」。⁴⁸同時在其他回紇契約文書上,又見有 čoŋ-tuŋ-pao-čao<中統(1260-4A. D.)寶鈔(USp 150)一詞。足見「鈔」、「保人」、「代保人」與「同取代保人」等借字,應在宋、元間被借入。契約行為亦當在此際學自漢人。

三、宗教信仰

突、回族先後信奉過撒蠻、景教、摩尼教、佛教與回教。其中佛教的信仰是深受中國影響的。回紇諸多佛典都是漢譯本的再譯。故漢語的詞彙特別多。許多梵文的對音,亦都輾轉借自漢語。如:

abita <阿彌陀 <(梵) amitabha (Uig. I 32₁₅)

bisamin <毗沙門 <(梵) vaisramana (TTVII 12₃)

bud <佛 <(梵) buddhā (TTVII 4₂₅)

bursaŋ <佛僧 <(梵) buddhā sangha (TTIV A₁₇)

māriči <蔑戾車 <(梵) mleccha (Hüen 99)

pusar <菩薩 <(梵) bodhisattva (Kuan 14)

sav <娑婆/沙訶/索訶 <(梵) sahā (Kuan 15)

šabi <沙彌 <(梵) śrāmanera (Suv. 199₁₆)

佛教發源於印度,然後經阿姆河(Amu Darya)流域,天山南路而傳入中國。復由中國傳進突、回族。佛教之傳入中國,顯然與漢通西域有關。據魏略:「昔漢哀帝元壽元年,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」。⁴⁹此乃中國人學習佛典

47. 十通分類總纂(臺北鼎文書局,民國64年)冊三,頁2.9。

48. 同前,頁2.71。

49. 魏略西戎傳,載於三國志(樂天本)30/859。

之開始。後漢明帝時，蔡愔至大月氏得佛經佛像，又帶迦葉摩騰、竺法蘭二僧於永明十年返洛陽。明帝詔建白馬寺以居之；並請二僧以漢文譯佛經四十二章。此即中國建佛寺譯佛經之濫觴。此後，佛教遂流行於中國。⁵⁰ 魏文帝時，已有人剃度為僧。後秦法顯又自長安往印度、錫蘭求佛法，佛教更盛。突厥崛起後，東突厥佗鉢可汗首先與中國佛教發生關係。隋書突厥傳云：

「齊有沙門惠琳，被掠入突厥中，因謂佗鉢曰：齊國富強為佛法耳。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。佗鉢聞而信之，建一伽藍，遣使聘齊氏，求淨名、涅槃、華嚴等經並十誦律。佗鉢亦躬齋戒，繞塔行道，恨不生內地」。⁵¹

佗鉢可汗在位十年之久，中國之佛教傳入突厥必於此時。至唐開元年間，突厥默棘連可汗仿唐建廟。大臣瞰欲谷（Tonjuquq）以「佛老教人仁弱，非武彊術」⁵²諫而拒之，東突厥之佛教乃告沒落。然西域自古即為中西文化交流之要道。唐時，中國與印度之僧侶來往都經此。據 von Le Coq 之報告：喀喇和卓（Qara-khoja）之北，地處天山山麓的 Murtuq 村中，有 Bäzälik 古寺。其廊下右方入口處，畫有中國十二僧像，均著深藍色法服，頭包白巾，上書各僧侶之名，皆用回紇文。據研究，上書之回紇語對音，均屬唐音。故知所繪為唐朝僧像。其廊下左側入口處，又有僧侶十二人。均著黃色法服。其姓名則用梵文書寫。⁵³ 考諸史實，繼突厥之後，回紇起而雄踞北亞。然於八四〇年為鄰族黠戛斯（Qirqiz）所敗。其中一支於懿宗咸通七年西走高昌。即吐魯番附近之喀喇和卓。雍熙元年（984A.D.）王延德自高昌還，獻其行紀於朝廷。據稱，當時高昌之地已有「佛寺五十餘區，皆唐朝所賜額。寺中有大藏經、唐韻、玉篇經音等」。⁵⁴ 熙寧元年（1068A.D.）回紇入貢，「求買金字大般若經。以墨本賜之」。⁵⁵ 元烏古孫仲端在其北使記亦云：

「惟和、沙州寺像，如中國。誦漢字佛書」。⁵⁶

50. 曾問吾：中國經營西域史（上海商務，民國25年）頁69-70。

51. 隋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84/2536。參北史突厥傳（開明本）99/3048。

52. 新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215下/4132。參舊唐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194上/3596。

53. A. von Le Coq: "Expedition to Turfan" JRAS (1909) p. 316.

54. 宋史外國傳高昌國（開明本）490/5717。

55. 宋史回鶻傳（開明本）490/5718。

56. 元烏古孫仲端：前引書，頁300。

如上述，佛教已盛行於回紇；佛僧且多熟悉漢字；佛典亦多譯成回紇文。二十世紀歐洲及日本探險隊已查獲不少回紇文佛典及斷片。這些佛典多屬大乘經典及秘密經典。如金光明最勝王經、方廣大莊嚴經、妙法蓮華經、觀無量壽經、彌勒下生經、佛頂尊勢陀羅尼經、天地八陽神呪經、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等。⁵⁷ 是知回紇多屬大乘教徒。但最引人注意的是，回紇文佛典大都是漢譯本的轉譯。因此漢字大量的被借入回紇語中。如：

aq	＜惡 (KP 625)	savšin	＜小乘 (Hüen 225)
baosin	＜報身 (Suv. 704 ₁₆)	sen-in	＜仙人 (FT 3 ₃)
bulaŋ	＜廡廊 (TTVI 85)	su	＜蘇 (Suv. 623 ₅)
buši	＜布施 (Man I 32 ₁₂)	suj/tsuj	＜罪 (Chuast 35)
čamqui	＜懺悔 (Suv. 25 ₂₂)	tajči-tulun	＜大智度論 (TTVB 89)
čīn	＜真 (MK 503 ₁₆)	tajču	＜大呪 (Suv. 361 ₁₉)
čīnzu	＜真如 (Suv. 203 ₁₈)	tajši	＜大師 (TT 1 ₂)
čajdan	＜齋堂 (Chuast L275)	tajšin	＜大乘 (Suv. 63 ₃)
dijan	＜定 (Suv. 614 ₉)	tatsä/tetsi/titsi	＜弟子 (TTVIII E5)
jaŋ	＜陽 (TTVI 385)	tsujurqa	＜慈 + -urqa (Suv. 619 ₁)
kim-xo-ki	＜ <u>金剛經</u> (TTV B1)	vapši	＜法師 (Hüen 215 ₂)
kojmso	＜含藏 (TTVI 207)	vapxuaki	＜ <u>法華經</u> (TTV B ₁)
küšalun	＜ <u>俱舍論</u> (TTV B84)	vibäki	＜ <u>維摩經</u> (Hüen 181 ₄)
qamtsi	龕子 (Suv. 642 ₉)	višiklün	＜ <u>唯識論</u> (TTV B 22)
quanši-im	＜ <u>觀世音</u> (Kuan C ₉)	xuašin	＜化身 (TTV A _{33,103})
samtso	＜三藏 (Hüen 230)	xun	＜渾 (MK III 138)
sam-bai-ki	＜ <u>三昧經</u> (TTV B1)	žin-van-pan-ki	＜ <u>仁王般若經</u> (QBN 241 ₁₀)

其他回紇文佛典殘卷中，則譯有十二因緣節目，如 tavrannaq (行)、alti qačır (六入處)、täginmäk (受)、amranmaq (愛) 等名稱。其為漢語之翻譯，歷然可見。⁵⁸ 當時回紇僧侶之熟悉漢語，可從回紇語佛典中得到另一力證。回紇不僅借用

57. 參羽溪了諦：西域之佛教（上海商務，民國22年）賀昌羣譯，頁310。

58. F. W. Müller: *Uigurica* II (ABAW: Berlin, 1911) pp. 13-4, 81-3.

漢字，同時把漢字原原本本地寫進譯文中。既不取對音，也不用翻譯。茲舉安慧俱舍論實義疏第十九章之回紇譯文如下：

- 1 四 türlüğ äzrua 福 larī 者 bular ärürlär 一者 kim xayū tüzün-
- 2 lār oʻli tüzünlär 女 i viʻar 寺 turʻurmaduʻ orunta 寺 tuʻursar
- 3 是謂一者 äzrua bujanī 二者 äski viʻarlarīʻ idsär sabsar 是謂
- 4 二者 äzrua bujanī 三者 tüz baz xilsar tüzün bursaŋ xuvraʻ-iʻ 是
- 5 謂 üčünč äzrua bujanī 四者如來 lar aŋbašlaju nomluʻ 輪
- 6 ävirgü ödtä alʻu 天 lärtä 世 tägi 人 larta kim usar bir tinlʻ. ödani(?)
- 7 ärikläp(?) nomluʻ tilgän ävirdgü-gä ödügči bolsar. 是謂四者梵福i⁵⁹

又舉漢文對照如下：

「今當說四梵之福，云何爲四。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，未曾起偷婆處，於中能起偷婆者，是謂初梵之福也。復次信善男子善女人，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之福也。復次信善男子善女人，和合聖衆者，是謂第三受梵之福也。復次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，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，是受四梵之福也」。⁶⁰

回紇受中國佛教影響之深，由此可見一斑。俄國突厥學家 Malov 且曾於甘肅肅州南部山中，發現1687-8年間之回紇文金光明經，⁶¹ 足見十七世紀後半尚有篤信佛教者。

四、曆 法 道 術

突厥「其書字類胡，而不知年曆，唯以草青爲記」。⁶² 隋書則云：「（突厥）無文字，刻木爲契」。⁶³ 其以十二支獸紀年始見於碑文。⁶⁴ 如：

bars jil ekinti aj biš jigirmikä (II/91)

虎年二月十五日

tabišʻan jil bešinč ajk(a) teg……(I/170-171)

59. 羽田 亨：「回鶻譯本安慧の俱舍論實義疏」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（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，昭和33年）頁176。

60. 同前，頁177。

61. W. Radloff-S. E. Malov: *Suvarnaprabhāsa*. BB XVII (1913), XXVII (1930).

62. 周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50/2340；參隋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84/2536；北史突厥傳（開明本）99/3048。

63. 隋書突厥傳（開明本）84/2536。

64. N. N. Orkun: *Eski Türk Yazıtları*, Istanbul I (1936), II (1939), III (1940)。

兔年五月

lui jılqa jetinč aj (I/130)

龍年七月

jılan jıl onunč ajq(a) (II/112)

蛇年十月

Kül tigin qoǵ jılqa jiti jegirmikā učdı. (I/52)

闕特勤羊年十七日仙逝。

bičın jılqa jitinč aj jiti otuzqa (I/52)

猴年七月二十七日

anda kisre taqıǵu jılqa (I/166)

其後於雞年……

bunča qazǵanıp aqanım qaǵan it jıl onunč aj alti otuzqa uča bardı.
(I/70)

如此努力奮鬥；家父，即可汗，終在狗年十月廿六日歸天。

Qarija on oq(q)a kirti laǵzın jılqa toqtım. (I/166)

向西進入 On-oq 之地。猪年我開戰。

據此，紀年法之傳入突厥則晚在唐朝。繼突厥之後，回紇之紀年亦無兩樣。茲將漢語及突、回語之支獸列表如下：

突回語	漢語	突回語	漢語
küskü (MOIV ₁₆)	子鼠	jund (MK I ₂₃₅)	午馬
ud (MK I ₃₄₆)	丑牛	qoǵ	未羊
bars	寅虎	bičın/pičın	申猴
tabışǵan/tavişqan	卯兔	taqıju/taqıǵu	酉雞
lū/lui/luu	辰龍	it	戌狗
jılan	巳蛇	laǵzın	亥豬

突、回語之十二支獸，除龍以外雖非漢語借字，但譯自漢語則很明確。事物紀原天地生植部「十二辰」條云：

「事始曰：黃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日，又以十二命獸屬之」。⁶⁵

突、回人除用十二支獸紀年，並用以紀日。如：küskü kün 鼠日 (TTVII 192)、ud kün 牛日 (TTVII 193)、jund kün 馬日 (TTVII 62)。日學者羽田亨因之懷疑說：

「曆中十二支獸之名稱，源出何處迄未敢斷言。中國不以獸名稱日；而以子丑寅卯等所謂十二支稱之。至於突厥、蒙古族則以獸名稱之，今仍沿襲。曆書上僅記十干，不記十二支而記以粟特語譯十二支獸，恐源自突厥、蒙古之習俗」。⁶⁶

此前，陔餘叢考亦載：

「是則十二辰之說，紛紛不定，從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。竊以爲此本無意義，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已。陸深春風堂隨筆謂：本起於北俗。此說較爲得之。唐書黠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，如歲在寅，則曰虎年。宋史吐蕃傳仁宗遣劉渙使其國，厮囉延使者勞問，具道舊事，亦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，馬年如此。輟耕錄記邱處機奏元太祖疏云：龍兒年三月日奏云云。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載：泰山有元碑二通。一泰定鼠兒年；一至正猴兒年，此其明證也。蓋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辰。但以鼠、牛、虎、兔之類，分紀歲時，浸尋流傳於中國，遂相延不廢耳」。⁶⁷

又云：

「……是後漢時，其說甚行。更推之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。竊意此本起於北俗。至漢時，呼韓邪款塞，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，遂流傳入中國耳」。⁶⁸

沙畹 (Ed. Chavannes) 乃附和其說，並謂：十二生肖是於公元一世紀爲突厥民族所創；且是突厥人首先使用十二生肖紀年。於公元48年南匈奴呼韓邪入居五原，即在陝西東北之榆林，乃傳入中國。又突厥領域雖少猿類，然公元一世紀突厥王Kaniska曾統治過乾陀羅 (Gandbâra) 及喀什米爾。該地區產有短尾猿。極可能在 Indoscythes 王子之前，其他突厥統治者已擴張至此區域。⁶⁹ 但此說實難令人折服。J. Halévy

65. 宋高承：事物紀原（惜陰軒叢書）天地生植部「十二辰」條。1/4a

66. 羽田 亨：西域文明史概要（東京弘文堂，昭和16年）頁177。

67. 清趙翼：陔餘叢考（甌北全集）34/7b-8a。

68. 同前，34/9b-10a。

69. Ed. Chavannes: "Le cycle turc des douze animaux" TP série II vol. VII (Leide 1906) pp. 85, 117, 122.

首唱反調，謂：突厥、蒙古之 lui, lū, lō 必借自漢語「龍」。因龍乃中國人想像創造之物。此外，兔、雞，特別是猴，爲突厥所陌生。建立於印度的月氏或貴霜 (Kuṣāns) 及公元78年的 Kaniska 王朝，皆未使用過十二生肖。特別是 Rājataranginī (帝統史) 之作者曾親歷喀什米爾亦不知其事。印度、希臘及亞美尼亞史家，對貴霜耳熟能詳，亦隻字未提。⁷⁰ 再據後漢書南匈奴傳：

「匈奴俗，歲有三龍祠，常以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戊日祭天神」。⁷¹

史記匈奴傳亦云：

「毋文書，以言語爲約束。……而單于朝出營，拜日之始生，夕拜月。……舉事而候星月，月盛壯則攻戰，月虧則退兵」。⁷²

是知匈奴未用十二生肖紀年、月、日，豈能傳介中國？

事實上，中國使用十二生肖早於突、回族及蒙古。王充論衡物勢篇云：

「寅木也，其禽虎也；戌土也，其禽犬也；丑未亦土也，丑禽牛，未禽羊也。……亥水也，其禽豕也；巳火也，其禽蛇也；子亦水也，其禽鼠也；午亦火也，其禽馬也。……午馬也，酉雞也，卯兔也。……巳蛇也，申猴也」。⁷³

後漢蔡邕月令章句云：

「是月之昏建丑，丑爲牛」。⁷⁴

月令問答又云：

「凡十二辰之禽；五時所食者，必家人所畜。丑牛、未羊、戌犬、酉雞、亥豕而已。其餘龍、虎以下非食也。……四季之禽，牛屬季夏；犬屬季秋，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。夏火王，火勝金，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。季夏土王，土勝木，當食豕而食牛。土，五行之尊者；牛，五畜之犬者。四行之牲，無足以配土德者，故以牛爲季夏食之。秋金王，金勝木，寅虎非可食者。犬、豕而無角，虎屬也，故以犬爲秋食也。冬水王，水勝火，當食馬；而禮不以馬爲牲，故以其

70. Joseph Harlévy: "Nouvell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 cycle turc des animaux" *TP série II*, vol. VII (Leide 1906) pp. 277-8.

71. 後漢書南匈奴傳 (樂天本) 89/2944；參史記匈奴傳 (樂天本) 110/2892。

72. 史記匈奴傳 (樂天本) 110/2879, 2892；參漢書匈奴傳 (樂天本) 94/3743, 3752。

73. 漢王充論衡 (世界文庫四部刊要, 民國44年) 頁31。

74. 後漢蔡邕：月令章句 (玉函山房輯佚)，冊十七，頁32a。

從借字看突厥、回紇的漢化

類而食豕也」。⁷⁵

後漢趙曄（長君）亦云：

「吳在辰，其位龍也，故小城南門上，反羽爲兩鯢鯢以象龍角。越在巳地，其位蛇也。故南大門上，有大蛇北向首內，示越屬於吳也」。⁷⁶

後漢書亦載：

「是月也，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，以送大寒」。⁷⁷

說文亦云：

「巳爲蛇象形」。⁷⁸

再往前推溯，宋王應麟曰：

「愚按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馬；午爲馬之證也。季冬出土牛，丑之證也」。⁷⁹

協紀辨方書亦載：

「陳敬仲筮者言，當昌於姜姓之國而釋春秋。謂觀之六四，納得辛未。辛爲巽，長女；未爲羊。羊加女爲姜。則是周時已有之矣」。⁸⁰

漢前之說法雖不盡可信。但十二獸配十二支已盛行於東漢，則無疑義。突、回族以十二支獸紀年始見於唐。用以紀日則更晚。是知其年曆亦始於唐，再早「唯以草青爲記」。至於蒙古，「先時蒙兀不諳厯算，故帝誕生月日，無知之者」。⁸¹

至於滿洲則又更晚。

同時，此十二生肖，以中國之陰陽五行解之，都能脗合。其爲中國產物也可採信。明王達蠡海集云：

「干有十，支有十二。干不配肖屬者，而支配者，天賦氣，地成形也。人所以稱肖屬，及支而不及干者，父施氣，母有形也」。⁸²

75. 後漢蔡邕：月令問答（玉函山房輯佚），冊十七，頁5a-5b。

76. 後漢趙曄：吳越春秋（四部叢刊）4/20。

77. 後漢書志第五禮儀中（樂天本）頁3129。

78. 參丁福保：說文解字詁林（臺北商務，民國48年）頁6633。

79. 宋王應麟：困學紀聞（四部叢刊）9/11b。

80. 清張照等：欽定協紀辨方書（四庫全書珍本）冊一，1/25b。

81. 清洪鈞：元史譯文證補（臺北西南書局，民國62年）1上/17。

82. 明王達：蠡海集（稗海）29a。

又云：

「十二肖屬，子爲陰極，幽潛隱晦，以鼠配之；鼠藏迹。午爲陽極，顯易剛健，以馬配之；馬快行。丑爲陰俯而慈愛，以牛配之；牛牴犢。未爲陽仰而秉禮，以羊配之；羊跪乳。寅爲三陽，陽勝則暴，以虎配之；虎性暴。申爲三陰，陰勝則黠，以猴配之；猴性黠。卯、酉爲日、月二門；二肖皆一竅。兔舐雄毛則孕，感而不交也。雞合踏而無形，交而不感也。辰、巳陽起而變化，龍爲勝，蛇次之。故龍、蛇配辰巳。龍、蛇者變化之物也。戌、亥陰歛而持守。狗爲勝，猪次之。故狗、猪配戌、亥。狗、猪者鎮靜之物也」。⁸³

陽谷漫錄亦云：

「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龍、巳蛇、午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雞、戌犬、亥猪十二相屬，前輩未有明其所以取義者。曩見日家璩公選云：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俱陽，故以相屬之奇數爲名。鼠、虎、龍、猴、狗俱五指，馬則單蹄也。丑、卯、巳、未、酉、亥俱陰，故取相屬之偶數爲名。牛四爪，兔四爪，蛇兩舌，羊四爪，雞四爪。其說極有理，必有所據」。⁸⁴

五行大義又云：

「取十二屬者，皆以其知時候氣或色或形，竝陰陽故也。……其十二屬竝是斗星之氣，散而爲人之命，係於北斗，是故用以爲屬。春秋運斗樞曰：樞星散爲龍、馬；璇星散爲虎；機星散爲狗；權星散爲蛇。玉衡散爲雞、兔、鼠；開陽散爲羊、牛；搖光散爲猴猿。此等皆上應天星，下屬年命也」。⁸⁵

再就希臘、巴比倫、波斯、蒙古、突厥、滿洲及中國所用之生肖列表比較如下：

	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
	巴 比 倫	希 臘	Teukros-Vatican	波 斯	中 國	突厥、回紇	蒙 古	滿 洲
1	Tiāmat	白 羊	貓 (波斯)	muš (鼠)	鼠	küskü(鼠)	Khuluguna (鼠)	singgeri (鼠)

83. 同前，29b-30a。

84. 洪興：「陽谷漫錄」，說郛（涵芬樓秘笈）73/7b-8a。

85. 隋蕭吉：五行大義（知不足齋叢書）5/44a-44b。參梁春秋緯運斗樞（玉函山房輯佚）冊43，頁3a-5b。

從借字看突厥、回紇的漢化

2	Kingu	金 牛	狗(巴比倫)	bakar(牛)	牛	ud (牛)	uker (牛)	ihan (牛)
3	蝮 蛇	雙 子	蛇(Cappadocia)	peleng(豹)	虎	bars (虎)	bars (虎)	tasha (虎)
4	蛇	巨 蟹	甲 蟲 (亞美尼亞)	Xargūs(兔)	兔	tabišyan (兔)	toolai(兔)	gūlmahūn (兔)
5	Lakhamu	獅 子	鱷 (亞洲)	nehenk (鱷魚)	龍	lū (龍)	loo (龍)	muduri(龍)
6	旋 風	處 女	獅 (愛奧尼亞)	mār (蛇)	蛇	jīlan (蛇)	mokhai(蛇)	meihe(蛇)
7	餓 狗	天 平	公 羊 (利比亞)	esb (馬)	馬	jund (馬)	morin(馬)	morin(馬)
8	蝸 人	天 蝸	公 牛 (義大利)	gūsfend (羊)	羊	qoǰ (羊)	khoīn(羊)	honin(羊)
9	大 旋 風	人 馬	鷹(克里特)	hamdūna (猴)	猴	bičīn (猴)	mečīn(猴)	bonio(猴)
10	漁 夫	山 羊	猴(敘利亞)	mūrg (鳥)	雞	taqīju(雞)	takiya(雞)	coko (雞)
11	角 獸	水 瓶	朱鷺(埃及)	seg (狗)	狗	īt (狗)	nokhai(狗)	indahūn (狗)
12	武 器	雙 魚	鱈魚(印度)	hūk (豬)	豬	layzīn(豬)	khakai(豬)	ulgiyan (豬)
註	a	b	c	d			e	f
a Sir E. A. Wallis Budge: <i>Amulets and Superstitions</i>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: London 1930) pp. 407-8. b <i>Ibid</i>, p. 411. c M. F. Boll: <i>Sphaera</i> (chez B. G. Teubner 1903) pp. 17-21, 295-6. d L. Ideler: <i>Über die Zeitrechnung der Chinesen</i> (Berlin 1839) p. 87. e—f J. H. Klaproth: <i>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'Asie</i> (Paris 1826) p. 169.								

綜觀上表，十二宮以巴比倫最早，然後傳入希臘。埃及人則又借自希臘。波斯人及祇教徒亦使用十二宮於宗教上。然後又從伊朗輸進印度。⁸⁶就十二生肖而論，Teukros的希臘文獻上亦見有一世紀左右的十二象徵物，用以紀時。⁸⁷同時在羅浮博物館又見有梵蒂岡稿本，亦錄有相同的十二生肖及其分野；稱之為 Bianchini 平面球形圖。⁸⁸但西方的十二肖與中國最近者，應屬波斯。至於阿爾泰民族中的突厥、回紇、蒙古及

86. Sir E. A. Wallis Budge: *Amulets and Superstitions*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: London 1930) pp. 411-2.

87. M. Franz Boll: *Sphaera* (chez B. G. Teubner 1903) pp. 17-21, 295.

88. *Ibid*, p. 296.

滿洲則與中國雷同。據此，突、回族及蒙古之十二生肖晚於中國，又與中國完全相同，其源出中國應無庸置疑。

又據回紇文獻觀之，回紇不只用十二支獸紀年，同時兼用漢語十干 <šipqan (TTVII 105)。茲列表如下：

突、回語	漢語	突、回語	漢語
qap/qav (TTVII 25 ₂₈)	甲	ki (TTVII 18 ₃₆)	己
ir (TTVIII P _{5,34})	乙	keŋ/qi (TTVII 18 ₉ , 10 ₄)	庚
pi (TTVIII P ₃₅)	丙	sin/äzin (TTVII 5 ₅₁)	辛
ti/tiŋ (TTVII 4 ₆)	丁	zim (TTVII 548)	壬
bu/bū (TTVII 4 ₁₆)	戊	kuej (TTVIII P ₃)	癸

德國探險隊在高昌遺址，發現有摩尼教徒編纂之曆書斷簡。是由粟特文、漢文及突、回文合寫而成。每日先記以粟特文，然後配以中國十干之對音，最後記以十二支獸名稱。另外以紅字記中國之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⁸⁹ 考十干，相傳為天皇氏所創，以定歲之所在。黃帝時又以十干相配作甲子。後漢蔡邕月令章句云：

「大撓探五行之情，占斗綱所建，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，謂之幹。作子丑以名日，謂之枝。枝幹相配以成六旬」。⁹⁰

五行大義又云：

「有事於天則用日；有事於地則用辰，陰陽之別，故有十干之名也」。⁹¹

以十二辰命時紀月，大概起於秦、漢之間。配以十干則較晚。六十甲子紀年之法，正式使用於東漢。但西漢三統曆已以太初元年(104B.C.)定為丙子。淮南子天文訓載：

「淮南元年(164B.C.)冬太一在丙子」。⁹²

惟十干紀日之法，其來甚古，經史、金石之外，甲骨文已普遍使用。如殷商武丁四四年(1296B.C.)七月小甲骨文載：

89. F. W. K. Müller: *Die "persischen" Kalenderausdrücke im chinesischen Tripitaka* (SPAW: Berlin 1907) pp. 3-6

90. 後漢蔡邕：月令章句（玉函山房輯佚）冊十七，頁2a；參宋劉恕：資治通鑑外紀（四部叢刊初編）1/9。

91. 隋蕭吉：前引書，1/3a。

92. 淮南子（四部叢刊）3/76。參高平子：學曆叢論（臺北中研院數學所，民國58年）頁190。

「丙辰卜貞：福告吳疾于丁，新鬯。(續 1.44.6)」⁹³

至於五行，首見於尙書洪範：

「一曰水；二曰火；三曰木；四曰金；五曰土」。⁹⁴

戰國時，騶衍唱陰陽五行之說，言相生相尅之理，遂爲術數之所託。協紀辨方書本原一載：

「天干則甲乙爲木；丙丁屬火；戊己屬土；庚辛屬金；壬癸屬水。地支則寅卯辰屬木，配東方也；巳午未屬火，配南方也；申酉戌屬金，配西方也；亥子丑屬水，配北方也。而土寄旺於辰戌丑未之間，配四方也。五星家又以寅亥屬火；辰戌屬金；子丑屬土；而午則爲日；而未則爲月者。則以子丑在下，故爲土；午未在上，故爲日月。寅卯辰巳，申酉戌亥，分佈左右，則如四時之流行於天地之間。故以其左右合宮，而別爲木火土金水之序也」。⁹⁵

von Le Coq 在吐魯番之西，雅爾湖 (Yar-khoto) 附近，發現回紇文書頁。⁹⁶ 上有卦象以斷人之禍福休咎。此爲中國易卦之推演則無疑義。是知中國之易占早已輸入回紇。爾後在吐魯番又發現有中國之符咒。下邊或旁邊附記回紇文。⁹⁷ 九星、建除十二神，sirki<節氣 (TTVII 4₃)、qunči<中氣 (TTVII 4₃₄)、šogün<上元 (TTVII 1₁)、vu/vū<符 (TTVII 14₄₂) 等借字出現其中。另有 likzir<曆日 (TTV I257)、taisuj<太歲 (TTVI 92)、tojun/tojin<道人 (Uig III 39₆)、taučar<道場 (Man III 34₂₁) 及青龍<kök lū (TTVI 94) 見於其他文卷上。此皆中國曆法道術傳入回紇之明證。茲將建除十二神及九星列表如下：

建除十二神：

突、回語	漢語	突、回語	漢語
ken/kin (TTVIII P ₃₄)	建	pa (TTVIII P ₃₂)	破
čü (TTVII 5 ₉)	除	kuv (TTVIII 4 ₂₄)	危

93. 董作賓：殷虛譜（中研院史語所，民國34年）下篇4/3a。

94. 尙書（藝文本）12/5b。

95. 清張照等：前引書，1/37a。

96. W. Bang-A. von Gabain: *Türkische Turfan-Texte I* (Berlin 1929).

97. G. R. Rachmati-W. Eberhard: *Türkische Turfan-Texte VII* (Berlin 1936).

man	(TTVII 11 ₃)	滿	či	(TTVII 11 ₁₀)	成
pi	(TTVIII P ₃)	平	šiu	(TTVII 6 ₇)	收
ti	(TTVII 4 ₃₇)	定	qaj	(TTVII 7 ₃)	開
čip	(TTVII 11b)	執	pi	(TTVIII P ₃₂)	閉

九星：

突、回語	漢語	突、回語	漢語
junkiu (TTVII 14 ₃₅)	文曲	vuku (TTVII 14 ₅₅)	武曲
kumansi (TTVII 14 ₁₃)	巨門星	limčin (TTVII 14 ₄₅)	廉貞
liusun (TTVII 14 ₂₄)	祿存	(?) (TTVII 14 ₇₅)	左輔
pakunsi (TTVII 17 ₉)	破軍星	(?) (TTVII 14 ₈₆)	右弼
tamlaj (TTVII 14 ₄)	貪狼		

建除之名早見於中國古書。史記日者列傳已有建除家。⁹⁸ 日知錄建除條又云：

「建除之名，自斗而起，始見於太公六韜云。開矛門常背建向破」。⁹⁹

淮南子天文訓亦載：

「太陰所建……寅爲建，卯爲除，辰爲滿，巳爲平，主生；午爲定，未爲執，主陷；申爲破，主衡；酉爲危，主杓；戌爲成，主小德；亥爲收，主大德；子爲開，主太歲；丑爲閉，主太陰」。¹⁰⁰

至於星象之學，明史天文志則云：

「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。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」。¹⁰¹

但以斗數推人命則較晚。王充論衡命義篇云：

「人之有吉凶，猶歲之有豐耗。命有衰盛，物有貴賤。……至於富貴，所稟猶性。所稟之氣，得衆星之精；衆星在天，天有其象。得富貴象則富貴；得貧賤象則貧賤。……天施氣而衆星布精；天所施氣，衆星之氣在其中矣。人稟氣而生，含氣而長。得貴則貴，得賤則賤。貴或秩有高下；富或貲有多少，皆星位

98. 史記日者列傳（樂天本）127/3222。

99. 清顧炎武：原抄本日知錄（臺南唯一書業中心，民國64年）30/869。

100. 淮南子（臺北世界書局，民國61年）頁3148。

101. 明史天文志（開明本）25/7130。

尊卑大小所授也」。¹⁰²

只見宿命之理論，而未有推命之律例。回紇文獻所載：

eq'ilki [t]amlay atlı jultuz ol. vñ-si bu ärür. küskü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sanlış toşar. (TTVII 14₄₋₈)

ikinti kumunsi atlı jultuz ol. vñ-si bu ärür. ud jil-liş, toquz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san-liş toşar. (TTVII 14₁₃₋₁₇)

üçünç lıusun atlı jultuz ol. vñ-si bu ärür. bars jil-liş, it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sanlış toşar. (TTVII 14₂₄₋₂₈)

törtünç junkiu atlı jultuz ol. vñ-si bu ärür. tavişğan jil-liş taqıu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sanlış toşar. (TTVII 14₃₅₋₃₉)

bişinç limçin atlı jultuz ol. vñ-si bu ärür. lñ jil-liş, biçin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san-liş toşar. (TTVII 14₄₅₋₄₉)

altınç vukū atlı jultuz ol. vñ-si bu ärür. qoin jil-liş, jılan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(sa)nliş toşar. (TTVII 14₅₅₋₅₉)

jit[inç pakunsi] atlı jultuz ol. vñ-si bu ärür. jont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(sanlış toşar.) (TTVII 14₆₅₋₆₉)

[säkiz-inç....atlı] (jultuz ol. vñsı bu ärür.) toquz jil-liş kişi bu jultuz-ğa san-liş toşar. (TTVII 14₇₅₋₇₉)

[toquz-unç....] atlı jultuz....(TTVII 14₈₆)

中譯如下：

首是貪狼星。其符如此。鼠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₄₋₈)

二是巨門星。其符如此。牛年及猪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₁₃₋₁₇)

三是祿存星。其符如此。虎年及狗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₂₄₋₂₈)

四是文曲星。其符如此。兔年及雞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₃₅₋₃₉)

五是廉貞星。其符如此。龍年及猴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₄₅₋₄₉)

六是武曲星。其符如此。羊年及蛇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₅₅₋₅₉)

102. 漢王充：論衡命義篇（臺北世界書局，民國44年）頁11。

七是(破軍星)。其符如此。馬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₆₅₋₆₉)

(八是左輔星。其符如此)。豬年生人屬之。(TTVII 14₇₅₋₇₉)

(九是右弼)星……(TTVII 14₈₆)

其與黃帝斗圖之說，不謀而合。五行大義載：

「黃帝斗圖云：一名貪狼，子生人所屬。二名巨門，丑亥生人所屬。三名祿存，寅戌生人所屬。四名文曲，卯酉生人所屬。五名廉貞，辰申生人所屬。六名武曲，巳未生人所屬。七名破軍，午生人所屬」。¹⁰³

比較前七星，回紇文之記載顯然轉譯自中文。同樣之七星亦見於唐開元占經：

「北斗第一曰破軍；第二曰武曲；第三曰廉（脫貞字）；第四曰文曲；第五曰祿存；第六曰巨門；第七曰貪狼」。¹⁰⁴

此外，又見於遁甲九神：

「遁甲九神者，天蓬在坎，一名子經，木神；在斗居破軍星。天內在坤，一名子成，水神；在斗居破軍星。天衝在震，一名子翹，金神；在斗居破軍星。天輔在巽，一名子文，土神；在斗居武曲星。天禽在坤，一名子公，火神；在斗居廉貞星。天心在乾，一名子衰，木神；在斗居文曲星。天柱在兌，一名子達，水神；在斗居祿存星。天任在艮，一名子金，金神；在斗居巨門星。天英在離，一名子殺，土神；在斗居貪狼星」。¹⁰⁵

是知隋唐只用七星，不言左輔、右弼。但協紀辨方書載大、小遊年變卦則用九曜。小遊年變卦云：

「其法以貪狼、巨門、祿存、文曲、廉貞、武曲、破軍、左輔、右弼爲序。以八卦面論，則右弼與左輔同宮。以九宮而論，則貪狼爲一白，屬水；巨門爲二黑，屬土；祿存爲三碧，文曲爲四綠，屬木；廉貞爲五黃，屬土；武曲爲六白，破軍爲七赤，屬金；左輔爲八白，屬土；右弼爲九紫，屬火。以五行而論，則貪狼爲生氣，屬木；巨門爲天醫，祿存爲絕體，屬土；文曲爲遊魂，屬水；廉貞爲五鬼，屬火；武曲爲福德，破軍爲絕命，屬金；輔、弼從本宮，無

103. 隋蕭吉：前引書，4/15a-15b。

104. 唐瞿曇悉達：唐開元占經（四庫全書珍本）67/10a。

105. 隋蕭吉：前引書，5/5b-6a。

崙屬。地理家從龍上起，以貪狼、巨門、武曲、廉貞爲吉；祿存、文曲、破軍、輔、弼爲凶。選擇家從向上起，以貪狼、巨門、武曲、文曲爲吉；祿存、廉貞、破軍、輔、弼爲凶；其取義自不相同」。¹⁰⁶

至於大遊年變卦則「以貪狼、廉貞、武曲、文曲、祿存、巨門、破軍、輔、弼爲序」¹⁰⁷

據上述，九星之傳入回紇當在唐以後。從文獻之用字及出土地點可得佐證。紀年之豬，回紇文獻均用 toɣuz (TTVII 14_{15,77})，而不用 laʃ zɪn/laqzɪn；出土地點則在吐魯番，足見此爲回紇西遷後之遺存。

五、文教語言

文教方面引人注意的是，中國文房四寶中的 bir/bir (v. Gabain) < 筆、mäkkä (MKIII 424) < 墨及 kaʃad (QBN 270₁₂)/kaʃid (QBN 235)/kägädä (TTVII 24₁₁, 25₁₂)/kägdä (TTVI 202)/qaʃat (QBN 55₁₉)/qaʃaz (QBH 106₁₉) < 穀紙／赫蹏，¹⁰⁸都已出現在突、回語中。尤其是 bir/bir (筆) 字在突厥碑文中常作動詞型 biti- (書寫) 而屢次出現。從這些借字足可顯示漢文化傳播之深遠。考諸史實，紙之製作，至蔡倫而集大成。是以樹皮、麻頭、破布及魚網等搗製而成。時在後漢元興元年(105 A.D.)。前此所稱之紙則指絹帛之類。再往前則爲木、竹簡。就漢簡之內容看，則屬紀元前之遺物。漢簡的時代可早到武帝晚期(勞榦：居延漢簡考釋序目，頁4, 14)。西域既有此遺物，足見漢籍流入甚早。再就木簡內容看，占卜、藥方、兵法、算學、曆法及小學無所不包。木簡之外，又在羅布泊之北發現有絹書信函及後漢之紙書戰國策。凡此，皆漢文化遠播西域之實證。¹⁰⁹漢以後，晉與南北朝之漢文獻亦曾出土。其內容尙不止於文書記錄之類。高昌之地，更有多數漢語佛典出土。¹¹⁰考高昌，早爲漢人屯田之地。其與中原之密切，自不待言。其「行國有八城，皆有華人」。¹¹¹「(服

106. 清張照：前引書，2/28a-29a。

107. 同前，2/43b。

108. 參勞榦：「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」中研院史語所集刊19本(民國37年)頁489-498；周法高：「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後記」，同前，頁499-500。

109. 參羽田亨：西域文明史概要，頁93-100。

110. 參香川默識：西域考古圖譜上卷(東京國華社，大正14年)。

111. 魏書高昌傳(開明本)101/2126。

飾)婦人略同華夏。……文字亦同華夏，兼用胡書。有毛詩、論語、孝經，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。……其刑法、風俗、婚姻、喪葬，與華夏小異而大同」。¹¹²「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」。¹¹³此亦華化之明證。其他各國侍子，久處文物之邦，薰陶漸染。漢化之深，不言而喻。再如和闐附近，yokten 出土之錢幣(五世紀左右之遺物)，一面鑄以漢字「五銖」，他面鑄以和闐語(Karoṭhi)，有國王之名。¹¹⁴此又是漢化之另一例證。一至大唐，西域諸郡設官，開屯列戍。復有遺謫犯人，商賈僧侶出入於此。漢人之流寓西域者，已大有人在。漢人之文教因此也推行於此。唐書卷104封常清傳云：

『封常清，蒲州猗氏人也。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，守胡城南門。頗讀書，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，教其讀書，多少歷覽』。

唐書卷104 哥舒翰傳又云：

「哥舒翰，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。……世居安西，……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」。

可見漢人之文教，不只行之於西域漢人；且廣及邊疆民族。此外，近代西域出土之唐代文獻頗多。佛典之外，經史詩文斷片、道教典籍，莫不有之。吐魯番出土之論語，庫車出土之漢書張良傳斷片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斷片，亦係唐代寫本。據此，漢人文教之流行於西域，更可採信。難怪 bakši<博士 (Suv. 682₁₇)、čüān-tsiu<春秋 (TTV B₁₂₀)、futsi<夫子 (TTI 106)、qun futsi<孔夫子 (TTV B₁₀₄) tsuān-ni<仲尼 (TTV B₁₀₃) 等都被借入突、回語中。再如文教用語 bučun/vučun<補充 (USp 484), kujn<卷 (TTV 202)、kög<曲 (MK III 131)、qunku/qunqav<壺篴 (TTIX 67, Uig. IV A₆₄, KP 69₇)、lun<論 (TTV B₆₄)、šivšai/siwsaj<秀才 (FT 1₂)、tajši<大師 (FT 1₂)、sü<序 (Hüen 2007)、üzik/üzük<字 (TTVII 413)、an<案 (Suv. 8₇) 亦在採借之列。

綜觀上述章節，漢族對突、回族的影響，是具有歷史性與多面性的。故漢字的採借也不例外。最早的突、回文獻中，如毗伽可汗 (Bilgä Qaǰan) 碑、闕特勤 (Kül

112. 周書高昌傳 (開明本) 50/2340；參北史高昌傳 (開明本) 97/3042。

113. 隋書高昌傳 (開明本) 83/2535。

114. A. Stein: *Serindia*.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, IV (Oxford 1921), plate CXL.

tägin) 碑及九姓回紇愛登里囉汨沒蜜合毗伽可汗 (Aj Taŋrıda kut bulmiş Alp Bilgä Qaŋan) 聖文神武碑，都有漢文的一面。借字之廣，職官、行政單位、動植物、日常用品、經濟用語、宗教信仰、曆法道術及文教，無所不包。甚至日常生活用語及冷僻字眼，亦在範圍之內。如：

ban	＜板 (Uig. II 70 ₅)	paxuiči	＜破壞+ -či (Uig. II 78 ₃₇)
bök	＜壁 (ThS II 14)	puši	＜樸實 (KP16,6)
čam	＜讒 (USp 73 ₁₃)	qaj/qij	＜街 (Uig. III 65 ₄)
čan	＜盞 (Rach I ₆₄)	qalıŋ	＜嫁奩 (MK III 372)
čuj	＜濁 (Suv. 74 ₂₂)	qamatsi	＜檻子 (Suv. 365 ₁₉)
jap	＜葉 (Tiš 49 ₄)	sın	＜身 (MK III 138)
kevirgänčig/kejirgänčig		sunzi	＜虱子 (MKI 422)
＜慨+ -irgänčig (Suv. 633 ₅₅)		taŋ	＜旦 (MKI 251)
labaj	＜螺貝 (Uig. I 22 ₂)	taŋ	＜堂 (TTVI 90)
lan	＜爛 (Rach I 156)	to	＜湯 (MK III 207)
letü	＜冷淘 (MK 550 ₁)	toq	＜禿 (MK I 322)
lin	＜櫟 (TTI ₂₂₅)	tuži	＜屠子 (TTIV A 55)
min	＜麵 (Rach I ₆₇)		
oqzin	＜亡人 (TTVI 59)		

這充分顯示，漢族與突、回族的關係，並不局限於民族間的政治、外交及經濟關係。人民相互間也有着密切的接觸與深入的了解。突、回族在長久性與多面性的漢化下，漢語借字自然而然地傾入突、回語彙中，使其語言有所變化。就以單字的組成而論，借入的漢字再附加突、回語的接尾詞而構成其他的詞類。如：

jenču	(珍珠) + -lüg > jenčülüg (有珍珠的)
kev	(慨) + -irgän + -čig > kevirgänčig (抱怨的)
paxuai	(破壞) + -či > paxuiči (破壞者)
so	(鎖) + -la > sola- (鎖上)
jun	(用) + -la > junla- (用掉)

tsuj (慈) + -urqa > *tsujurqa*- (同情)

tey (等) + -lä > *teylä*- (比擬，相提並論)

同時，在語法上也受了影響。如：

xua čēčāk (Suv. 608₁₀) 花。

xualıx čēčäklig (Suv. 589₂₀) 有花的，帶花的。

借字的 *xua* (花) 與本字 čēčāk (花)，兩個同義字並列而構成名詞片語；且與個別單字同意。同時，個別單字之後附加接尾詞 -lıx 及 -lig 又構成同義的形容詞片語。

再如 *jay* (樣) 則被借入，用以表示樣態或程度。例：

jıparlı bilgili *tey*-i bir *jay* (QBN 34₁₂)

麝香與知識一樣。(表示樣態)

*usa*ı *jay*-ča içgöl artuq içsär bolmaz (Rach I₁₇₁)

按渴度而飲，多飲無益。(表示程度)

再如 *tey* (等) 字則被借入，用以表示數量或程度。例：

*ulu*x bodistslarnıñ köñül-i birlä *tey* köñülüg bulmaı bolur. (Uig II 48₁₃)

他能修得與大菩薩同等的心腸。(表示程度)

sü *tey*-i jeti biñ oñ lan erti. (E26₈)

士兵之數共七千。(表示數量)

*a*ırladım ötrü ol erdäm *tey*-i. (QBK 34₁₁)

我視德行之好壞而尊重之。(表示程度)

同時又與突、回語構成各種成語。例：

ülgü *tey* 尺度大小 (Suv. 16₇₈)；*tey* adıncıx 各種的 (KP 34₁)；*tey* tuş 同種的 (QBN 309₄)；üküs türlü *tey* 各種的 (TT II A₅₈)；ülgülanç-siz *teylän*çsiz 無法測定的 (Suv. 151₅)；*tey* qıl- 比作 (QBN 57₁₀)；ülgü *tey* tut- 限定 (Suv. 136₂₂)；ülgülä- *teylä*- 測定比較 (Suv. 167₁₈)；*tey tey* 等等 (TTVI 62)。

除單字、語法受漢語的影響外，章法亦不例外。特別是中國的契約書式已被突、回人所模仿。二十世紀初，A. Gürünwedel、O. Klemetz、A. von Le Coq、N. N.

從借字看突厥、回紇的漢化

Kroktob、G. Manneheim、S. E. Malov、W. Radloff、西北科學考察團、西北文物考察團及日本大谷探險隊，分別在吐魯番、烏魯木齊、庫車及 Astana 等地，蒐集一些文書資料。其詳確年代雖不可考，然據體裁、紙質及用語等判斷，則可推定為九至十四世紀間之遺物。即從回紇西走天山後，至東察合台汗國崩潰止。文書內容則與回紇之人口買賣、消費借貸及土地交易等有關。契約書式幾與漢人之書式雷同。易言之，深受中國的影響。如日人橘瑞超氏在喀喇和卓附近所獲之女人買賣契約書。¹¹⁵形式極為完備，並有四位證人記名蓋印為證。若與載有唐大曆、建中年號之金錢借貸文書相比，幾無二致。¹¹⁶另舉胡麻借貸文書¹¹⁷為例：

- 1 (a) küskü jil altinč aj on jañıqa
(b) maña Kaisıtuqa tüškä künčit
kärkäk polup El-tämirtin pir köni
künčit altım. (c) küs iki köni kün-
5 čit perür män. (d) Permatin kächürsär män el
jañınča tüši pirlä perür [män.] (e) Perkinčä
par jok polsar män inim Kusukñıñ
tekilär pirlä köni persünlär. (f) Tanuk
Karpak, tanuk Pürkäk. (g) Pu nišan
10 mäniñ ol. (h) män Kaisıtu ösün
pititim.

中譯如下：

(a) 鼠(子)年六月十日，(b) 我 Kaisıtu 需胡麻一斗，茲以付息方式向 El-Tämır 借貸。(c) 新秋雙倍奉還。(d) 若違時限不還，將從鄉例生利。(e) 若舉債後東西逃避，將由舍弟 Kasuk 及其家人償還。(f) 證人 Karpak，證人

115. 見香川默識：西域考古圖譜下卷(8) 回紇文書(東京國華社，大正14年)。

116. A. Stein: *Ancient Khotan*. Detailed report of arch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istan (Oxford 1907) pp. 527-8.

117. W. Radloff: *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* (Leningrad 1928) p. 7; 參 S. E. Malov: *Pamjatniki drevnetjurkskoj pisymennosti* (Moskva-Leningrad 1951) p. 208.

Pürkäk。(g) 此乃我印。(h) 我 Kaisitu 親書。

(a) 借貸日期，(b) 借貸者、理由、借貸物及數量，(c) 還期及利息，(e) 保證，(f) 證人，(g) 債務者印記，(h) 書契人等形式，均與中國文書有密切關係。¹¹⁸他如土地、人口、家畜、農作物、養子及遺產分配等契約文書，就形式與內容看，亦都顯示漢人的影響。

六、結 語

繼匈奴之後，突厥、回紇先後崛起於北疆西陲，而與漢族發生密切的關係。雙方除了征戰，尚有商業的來往及文化之交流。是故漢字無形中流入突、回語中。其範圍之廣，包括政治經濟、宗教信仰、曆法道術及文教語言。易言之，突厥、回紇與漢人的接觸，既深遠且廣泛。從政治方面的借字顯示，突、回族的統治階層極愛慕漢人的政制。從宗教信仰、曆法道術、文教語言及經濟方面的借字反映，突、回族的平民階層頗敬仰漢文化。不管是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，都深受漢族的影響。

西方學者如 von Le Coq 相信：回紇如同其祖先，皆以西方文化為本。漢文化的影響，僅止於表層。他認為佛教、摩尼教與基督教，皆源出西方。書寫之蘆葦筆與醫藥常識亦不例外。¹¹⁹然從借字觀察，此說實難令人首肯。佛教雖源出西方。但突、回人之佛教則輾轉學自漢人；所信奉者乃漢人之佛教。至於書寫工具之筆，常以動詞形態出現於突厥碑文及回紇文獻；作「書寫」解。至今沿用，且分佈於各方言。他如政治經濟、曆法道術及文教語言，無不深受漢人影響，豈僅止於表層？！

借字，取自突厥、回紇本身的文獻；是精神現象之重要表徵；更是漢化深淺之具體例證。

略 語 說 明

BK Bilgä Qağan yazıtı. H. N. Orkun: *Eski Türk yazıtları*, I (Istanbul 1936)

118. 詳見謹 雅夫：「ウイグル文消費貸借文書」，西域文化研第四（法藏館1961）頁223-254。

119. A. von Le Coq: *Buried Treasure of Chinese Turkestan* (London 1928) trans. by A. Bowell, pp. 21-22.

- Chuast A. von Le Coq: *Chuastuaniſt*, ein Sü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ores (Berlin 1921)
- W. Radloff: *Chuastuaniſt*, das Bussgebt der Manichäer, (St.-petersb. 1909)
- E Yenisey Yazıtları. H. N. Orkun: *op. cit.* III (Istanbul 1940)
- FT Fen Czja-šen-E. Tenišev: "Tri novykh ujgurskikh dokumenta iz Turfana. *Problemy Vostokovedenija* No. 3 (1960) pp. 141-9.
- 捨尼舍夫及馮家昇:「回鶻文賦通(善賦)賣身契三種 附控主人書」考古學報 No. 2 (1958) 頁 109-120。
- Hüen A. von Gabain: *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-tsangs* (SBAW: Berlin 1935)
- A. von Gabain: *Brief der uighurischen Hüen-tsang Biographie* (SPAW 1938)
- KP P. Pelliot: "La version ouigoure de l'histoire des prince Klyān-amkara et Pāpamkara" *TP* XV (Leide 1914) pp. 225-272.
- Kuan W. Radloff: *Kuan-ši-im Pusar*, Eine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. Kapitals der chinesischen Ausgabe des Saddharmapundarika BB. XIV (St.-petersb. 1911)
- Lok W. Bang-G. R. Rachmati: *Die Legend von Oruz Qazan* (SPAW 1932)
- A. M. Sčerbak: *Oguzname. Muxabbat-name* (Moskva 1959)
- Man A. von Le Coq: *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* (APAW: Berlin) I (1912); II (1919); III (1922).
- Mě Mojun Čur (Shine Usu) yazıtları. H. N. Orkun: *op. cit.*, I (Istanbul 1936).
- G. R. Ramstedt: "Zwei uigurische Runenninschriften in den Nord-Mongolei, *JSFOu* 30:3 (1913)

- MK M. Kašgari: *Oivanü Lûgat-it-türk* Tipkibasımı (Ankara 1941) *Dianü Lûgat-it-türk tercümesi*. çev. B. Atalay, I-III (Ankara 1939-1941)
- MO S. E. Malov: *Uigurskie rukopinje dokumenty ekspedicii* (Leningrad 1932)
- QB R. Rachmati Arat: *Kutadgu Bilig*, I. metin (Istanbul 1947)
- QBK Yusuf Has Nacib: *Kutadgu Bilig*, tipkibasım III, Misir nüshası (Istanbul 1943)
- QBN Yusuf Has Nacib: *op. cit.*, tipkibasım II, Fergana nüshası (Istanbul 1943)
- Rach G. R. Rachmati: *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* (SPAW 1930)
- S W. Bang-A. von Gabain: "Uigurische Studien I. Das Sündenbekenntnis aus dem Suvarnaprabhāsa" *UJb* 10: 3 (1930) pp. 193-207.
- Suv. W. Radloff-S. E. Malov: *Suvarnaprabhāsa*-Altun jaruk (Sutra "Zolotogo-bleskä) I-II (St.-Petersb. 1913)
- Th S V. Thomsen: M. A. Stein's Manuscript in Turkish "Runic"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g-huang, *JRAS* (1912) pp. 181-227.
- Tiš W. Radloff: *Tišastvustik*, Ein in türkischen Sprache bearbeitets budhistisches Sutra, BB. XII (St.-petersb. 1910)
- Ton Tonjuquq Yaziti. H. N. Orkun: *op. cit.*, I (Istanbul 1936)
- TT *Türkische Turfan-Texte* (ABAW: Berlin), I (1929); II (1929); III (1930); IV (1930); V (1931); VI (1934); VII (1936) VIII (1954); IX (1958); X (1959).
- Uig. *Uigurica* (ABAW: Berlin), I (1908); II (1911); III (1922); IV (1931).
- USp W. Radloff: *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* (Leningrad 1928).

附記：本文承管東貴、陶晉生及丁邦新兄惠閱，謹此誌謝。